

文章编号:2095-0365(2013)01-0030-04

草堂:杜甫的思想憩园与诗艺家园

王艳军¹, 王 睿², 牛蕴婷²

(1.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2. 武警石家庄士官学校基础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 要: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了近5年时间,草堂的安逸使杜甫苦难的心灵有了暂时的栖息之地,草堂成为杜甫思想的憩园,但草堂的闲适并不能改变杜甫漂泊流离的命运,也不可能消弭杜甫的政治热情和情感倾向,闲情雅致、惬意自得的情趣与叹身忧时、顾念乾坤的思想扭结在一起,体现出草堂时期杜甫情感上的矛盾和困惑;另一方面,草堂时期杜甫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思想情感的沉郁老成,使他有时间审视和反思社会人生及诗歌创作,杜甫的诗歌理论在草堂时期逐渐形成并完善,古体诗创作得到延续、近体诗创作(尤其是五律)走向成熟,杜甫的诗艺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草堂成为杜甫的诗艺的家园。

关键词:杜甫;草堂;思想憩园;律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成都草堂,杜甫居住了近5年时间。在这“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1]485}的生命历程中,成都草堂成为杜甫的家园。生活的安逸、情趣的闲适使草堂成为杜甫思想的憩园;杜甫此期创作的342首诗歌,占整部杜诗的五分之一多,草堂又成为杜甫诗艺的家园。成都草堂及其这些草堂诗歌,给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亲切的杜甫,闲情雅致、惬意自得的同时又叹身忧时、顾念乾坤的情趣的扭结,让人感觉到草堂暂时的安逸带给杜甫情感上的影响;古体诗创作的延续、近体诗创作(律诗)的深入和完善,让人看到杜甫诗艺的升华。

一、思想的憩园

从困居长安开始,杜甫开始了苦难流离的生活历程。安史乱发,杜甫于至德元年(756)秋奔灵武而陷贼,至德二载(757)春间道归凤翔而任左拾遗,乾元元年(758)六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春自东都洛阳归华州、七月弃官赴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奔成都,上元元年(760)春

定居于成都草堂。“三年饥走荒山道”(《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一岁四行役”(《发同谷》)的艰辛历程,使杜甫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民生的苦难和时事的多艰。草堂的安逸使杜甫苦难的心灵有了暂时的栖息之地,闲适自得、愉悦欢欣的情趣得到极大的释放,而暂时的安逸又使杜甫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来审视这段生活,思想更加沉郁,草堂成为杜甫思想的憩园。

安史乱后,固然有时局动荡、政治失意的原因,衣食无着、生活艰辛却是杜甫流离漂泊最主要的原因。“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椽,儿女饿殍者数人”^{[1]12}以及“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1]14}等史料以及“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发同谷》)、“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木皮岭》)等诗作都反映了杜甫此期生活的艰辛。定居于浣花溪畔的草堂,诗人杜甫终于结束了饥饿穷山、流离道路的生

收稿日期:2012-11-30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2WX028);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2011625)

作者简介:王艳军(1971—),男,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活,尽管生活中杜甫还要经常乞求依赖他人,就像“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等诗所描述的那样,但“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2]746}的生活境遇,饱经战乱流离的诗人杜甫终于可以享受生活暂时的安宁闲逸,体验独在烟尘之外的闲暇意趣,《为农》、《宾至》、《狂夫》、《江树》、《南邻》、《草堂即事》、《田舍》、《江涨》、《北邻》、《泛溪》、《西郊》、《游修觉寺》、《后游》、《遣意二首》、《漫成》、《春夜细雨》、《春水》、《独酌》、《徐步》、《水槛遣心二首》、《朝雨》、《晚清》等诗充分展现了草堂生活的安逸和美好,思想情趣的愉悦和欢欣。如“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为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等诗,写出了草堂幽僻的环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其一)、“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其一)、“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春水》),写出了草堂环境的清幽;“昼引老妻乘画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写出了草堂生活的自适自乐;“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忽取尽余杯”(《客至》)写出了草堂生活的朴实。

然而草堂的安逸、生活的闲适并不能改变杜甫羁旅的境遇和哀伤的情感。杜甫在初抵“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成都府时,就发出了“忽在天一方”、“未卜见故乡”、“中原杳渺茫”(《成都府》)的中原遥隔、游子羁旅的哀叹,这也就奠定了杜甫入蜀诸篇的情感基调。描写草堂生活闲情逸致、呈现别样的风格情趣的诗作在整部杜诗中虽然很少见,但也正如冯至先生所说:“此类诗作在杜甫风云变幻忧患重重的诗史里,有如暴风雨中暂时的晴霁,重峦叠嶂中的一缕清溪”^[3],诗作中始终无法回避羁旅哀伤、叹世思乡、忧时伤身的情感。如《泛溪》前面写“练练峰上雪,纤纤云表霓。儿童戏左右,罢弋毕提携。翻倒荷蓑乱,指挥路径迷。吾村霭冥姿,异舍鸡亦栖。衣上见新月,霜中登故畦”,描述了泛溪远游、秋色在目、对雪见霓、儿童戏逐、提罢得鱼、翻荷采藕等浣花溪畔的美好景色,最后却以“浊醪自初熟,城东多鼓鼙”来结尾。《村夜》描写了“风色萧萧暮,江头人不归。村春雨外急,邻火

夜深明”的江村美丽的夜景,后面则由自己的暂时安居想到了“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的忧虑时事而思家之情。此类诗作还有《江亭》、《出郭》、《云山》、《可惜》、《散愁》等。可见杜甫虽极力描写闲适之趣,“奈何杜甫并非真正的旷达之人!这是他的痛苦和悲哀!”^[4],也正因为这,才使“杜甫田园诸诗,气力沉雄,骨力苍劲处,本色不可掩。”^{[2]1659}

对于草堂的怡然环境和草堂诗的独特风格,前人多有论述,杜甫本人也有“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近说峨嵋老,知余懒是真”(《漫成》二首)、“不堪只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的诗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杜甫有隐逸之思,如《杜臆》点评《为农》诗说“自安史倡乱,遍地兵戈,江村独在烟尘之外。如圆荷细麦,举目所见,景物可嘉。故将卜宅为农,有终焉之志”^{[2]740},将杜甫与陶渊明相比较,并以杜甫的隐逸思想来阐释此期杜甫的心态和草堂诗的意蕴。然草堂的安逸和生活的困窘、远隔中原的境遇和对政治时事的热切关注的矛盾,也就意味着杜甫终归不是陶渊明,草堂也只是被杜甫美化了。

如“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陶渊明《杂诗二十首》其一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忽取尽余杯”——杜甫《客至》

“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杜甫《寒食》

在陶渊明、杜甫的诗中都写到了与农夫同饮、与邻里往来的欢乐愉悦生活,但陶、杜的生活情趣人生理想并不相同。陶渊明辞官而安居田园,但“陶渊明的归隐主要是由其个人性格造成的,与政治虽有关系,但瓜葛不大。陶渊明对田园的向往,并非完全是客观情势所迫,或政治理想的幻灭所导致的退而求其次”^[5],因此陶渊明志在隐居,“止于田园,安于田园,故而乐在田园,所以在酒话滔滔、酒香飘飘中,田园与诗人一片化机”^{[6]25}。杜甫辞官流离之后暂居草堂,完全是客观形势所迫,政治的失意、战乱的社会、困苦的生活等多种外在因素以及“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2]972}的情感精神等内在因素,使杜甫虽然写了家居田园

的欢乐、展现了草堂时期精神的愉悦,杜甫内心像浣花溪水一样不可能平静如一,杜甫无法也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志在隐居而安居田园,由自身遭遇而时刻顾念着草堂外的世界,这也正是杜甫与陶渊明、杜甫草堂田园诗与陶渊明田园诗的区别。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楠》、《恶树》、《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等作品采用比喻手法借物抒发关怀天下的思想,像《春日江村五首》这样描写江村美丽春景的作品,也寄寓着忧思。诗人在“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燕外晴丝卷,鸥边水叶开”的江村曲流的景色中,有“茅屋还堪赋,桃园自可寻”如渊明般避世之思,表面看来诗人表达了“茅屋虽堪寄迹,而桃园尚自系思”^{[1]482}的思想,实则诗人则通过“漂泊到如今”“蹉跎有六年”、“老翁”“扶病”等语句表达饱经丧乱之感:“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正如浦起龙所说“江村一曲,放眼乾坤,家国俱远矣;春日无多,伤心时许,身世靡常也”^{[1]482}。因此杜甫虽描写草堂美景但不可能沉浸其中,“睹景则销愁,思家则生愁”^{[2]787}以及“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是杜甫这位羁旅草堂的“江边老人”(《释闷》)、“天边老人”(《天边行》)的矛盾心态,生活暂时愉悦的草堂不过是饱经忧患的杜甫“一生中的调味品”^{[6]32},一个暂时的思想憩园。

二、诗艺的家园

“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春日江村五首》),杜甫心里可能有过桃花源似的梦想,但正如上文所述,杜甫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选择隐逸。草堂的闲适并不能改变杜甫漂泊流离的命运,也不可能消弭杜甫人生的困苦。尽管仍关注着政治和社会,却给杜甫带来了一个身心调整的时期,使他有时间反思自己和社会,诗歌创作之中少了困居长安和流离陇右时期的锋芒毕露式的情感宣泄,更多以沉郁曲折的个人生活及社会政治的思索,流露出更多的伤感和沉痛,五古、七古得到延续的同时,五律、七律的创作也进入高潮。另一方面,杜甫到成都时49岁,离开成都时54岁(去世时59岁),草堂时期杜甫渐趋暮年,思想渐趋老成和深邃,杜甫的诗歌理论在草堂时期也逐渐形成并完善,杜甫的诗艺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草堂成为杜甫诗艺的家园。

杜甫于上元元年春卜居浣花溪畔,定居于草堂,在生活较为安逸、思想较为闲适的上元二年,

杜甫创作了《戏为六绝句》,这篇诗论与夔州时期创作的《偶题》及《解闷十二首》都表现出杜甫鲜明的诗歌理论主张,标志着杜甫形成了自己较完整的论诗思想体系。仇兆鳌为《戏为六绝句》作注时认为六绝句是“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题云戏为六绝,盖寓言以自况也”^{[2]902},这种说法抓住了这组诗的主旨,杜甫在六绝句中对前贤和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反思。组诗以四杰、庾信为论述对象,针对“尔曹”们对四杰、庾信的指责,杜甫以“尔曹身与名俱废”的现实与四杰、庾信之文“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对比,对四杰、庾信进行肯定,进而提倡“反对好古遗近,提倡学习六朝”^[7]。同时杜甫还为如何学习前人以及自己进行诗歌创作指出了思路和方法,那就是“亲风雅”、“转益多师”、“当时体”。“亲风雅”是诗歌创作的情感依据;“转益多师”是诗歌创作的手法;“当时体”是诗歌创作的风格特征的概括。“亲风雅”、“转益多师”、“当时体”既是杜甫对前人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杜甫对自己诗歌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更是杜甫一生诗歌创作奉行的宗旨。

据《读杜心解》所载,杜甫在草堂期间共创作诗歌342首。其中五古37首、五律169首、五绝2首、五排25首、七古36首、七律48首、七绝24首、七排1首,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草堂诗作中数量最多的是律诗。而就杜甫一生创作的782首律诗来看,其中五律630首、七律152首。杜甫入蜀前分别创作五律149首、七律23首,离开草堂后创作五律312首、七律81首,草堂时期所创作律诗217首(五律169首、七律48首)占杜甫全部律诗的28%,其中不论是五律还是七律都超过了入蜀之前的作品数量总和。因此可以说杜甫草堂时期最有成就的是律诗。草堂时期的律诗较少夔州时期往事的回忆和历史的反思,多写草堂生活风物,多抒发关注个人境遇和时世社会的矛盾情感,可以说五律更加成熟,七律在形式和格调方面渐趋完善。同时,草堂时期的律诗创作体现着鲜明的杜甫诗论思想,草堂时期的律诗在描写风情雅致草堂生活的同时,“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的生活和情感都反映在诗歌之中,体现出鲜明的“亲风雅”的写实风格;转益多师、开拓创新,杜甫草堂时期的律诗由于题材的丰富、形式的多样、风格的独特而体现出鲜明的“当时体”特征。

“亲风雅”是杜甫一生诗歌创作的情感追求,

草堂时期的律诗也不例外,尤其是五律。“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后游》)的情感困境和“缘情慰飘荡”(《偶题》)的人生苦难和社会治乱的经历,使杜甫草堂时期的五律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同时,不再像其五古、七古诗作那样锋芒毕露、酣畅淋漓似的直接表达“致君尧舜尚,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政治热情,而是在跌宕顿挫的韵律中表达感伤和凄苦,诗风愈加沉郁。杜甫之前人们用五律来抒怀、写景、记事、咏物、言情,杜甫还将时事政治融入五律之中。如《云山》诗触物抒情,自伤身世,以水宿之鸟作江上哀声表达“异地羁孤,客子哀号”^{[2]749}之感慨;《村夜》写“江秋夜雨,乱离远客之悲”^{[1]410};《恶树》、《病柏》、《枯楠》等表达选贤任能之愿望;《病桔》、《枯棕》抒发对奢侈的讽刺、愤慨之情。再如

《恨别》、《遣愁》、《释闷》等直接以“愁”、“怨”、“恨”、“闷”等词为标题的五律就有21首。从形式上,杜甫五律之作还多采用组诗的形式来寄寓政治,如《散愁》二首、《遣意》二首、《漫成》二首、《西山》三首、《有感》五首、《建都十二韵》等。可以说,内容上大量融时事于五律,形式上单篇创作并辅以大量组诗,手法上采用融情入景、情景交融、触物起情等多样手法,杜甫草堂时期的律诗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思乡与叹世等多种情感的融合,再辅之以韵律严整、句法多样、手法丰富的艺术形式,杜甫的五律在草堂时期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前人认为“杜甫入蜀诸篇,绝脂粉以坚其故,践丰神以实其髓,破绳格以活其肢,首首持幽擷奥,出鬼入神,诗运之变,至此极盛矣”^{[2]727},杜甫的五律何尝不是这样,正是中国古代五律之作中的“当时体”的典范。

参考文献:

- [1]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冯至.杜甫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36.
[4]陈贻焮.杜甫评传(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96.
[5]王群丽.陶渊明归居田园的精神困境[J].山东社会科

- 学,2005(10):44.
[6]傅道斌,陈永宏.歌者的悲欢[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7]胡大浚,杨晓霁.反对好古遗近,提倡学习六朝——浅谈杜甫的<戏为六绝句>[J].社科纵横,1994(4):22.

Caotang: the Agreeable Garden for Thinking and Perfect Homeland for Creating of Dufu

WANG Yan-jun¹, WANG Rui², NIU Yun-ting²

(1. Humanities College,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2. Training Department, Shijiazhuang Police Commanding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 Dufu had been living at the Caotang in Chengdu for five years, the peace of the shelter provided a temporary rest place to comfort his bitter and sad heart and an agreeable garden for thinking. Though the leisure life at Caotang failed to change the drifting and separating destiny of Dufu, and it was unable to weaken his political enthusiasm or to change his emotional tendency as well. On one hand, he was lost in a leisurely and carefree life, on the other hand, he always cared for the fate of his nation this kind of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presented his conflict in emotion and puzzles at that time. Howe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living at Caotang,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perplexing emotion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Dufu to observe and introspect the life and society based on which many poems were created. It was in this period that his poetry theory had been gradually formed and improved, his ancient poetry creation had been kept on, and his contemporary poetry creation (especially Wulv) had been more mature. The poetic writing and creating skills of Dufu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and Caotang became his perfect homeland for the creation of poetry.

Key words: Dufu; caotang; agreeable garden for thinking; lvshi

(责任编辑 王丽娟)